

# 学习周恩来经济思想

刘国光 毛立言

中国近代在经济文化诸方面落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事实和由此陷入的悲惨境地，决定了尽快实现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是历史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当我们在1949年通过长期革命战争的浴血奋斗终于争得了对外独立和对内统一这个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时，能否深刻而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基本历史趋势和任务，就成为能否承担起领导建设新中国的关键；能否始终坚持和加深对这一基本历史任务的认识，则是我国经济建设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

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核心主要成员之一，在其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实践中，始终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整个经济建设的核心和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思想和目标，是周恩来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就向全国人民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页。以下此类引文加\*，只注页码）当经过努力，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后，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式启动。周恩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仅更为明

确地提出了“经济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而且第一次非常郑重和明确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我国“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第132页）。周恩来认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第132页）基于这种对我国历史发展基本趋势的把握，周恩来以后多次强调这一任务和目标，不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必须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直到十年动乱中，周恩来已经身患重病时，在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还重申了1964年12月向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号召全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第479页），充分显示了他对这一基本目标的执着和坚定。

周恩来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我们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是要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是有着他的深刻的理论依据和认识依据的。他把握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宗旨，即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活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周恩来明确指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

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第132页）从基本上讲，周恩来从中国历史的发展及其与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这个宏大的视野，深刻地洞察和认清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趋势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主题，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是摆脱落后境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要求和需要。

周恩来不仅坚定而明确地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根据我国的国情指明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要求和推进这一基本历史任务的战略步骤。周恩来提出，我们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具体要求，“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他还从四个现代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出发，强调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第412页）

对于我国推进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战略步骤，周恩来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第479页）从实际的发展进程来看，虽然存在着“文化大革命”那种必然会阻碍现代化进程的非正常的动乱因素，但第一步目标还是基本上实现了。第二步目标要求和实际进程不可能完全吻合，其中有“文化大革命”那种政治上的因素的影响，也有对国情和现代化的客观标准和内涵认识不足的地方。周恩来作为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首倡者，并

始终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付出了毕生精力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的奠基者的开拓者，虽然他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且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很好地付诸实施，但其影响却是巨大和深远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和我们党重又确定的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周恩来这一核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二

中国的现代化不是通过资本主义途径实现的现代化，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工业化完成和现代化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前提下的社会主义。这个现实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有着很大的差异。怎样认识这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怎样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形态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就成为一个非常深刻的具有很大难度的历史性课题。

周恩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领导者，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和在探索中发展，对现实中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国社会的性质和未来走向问题，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和将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实际上已经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问题摆到人们面前。基于对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高度和物质基础的认识，周恩来不仅严格区分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而且认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转化也应该有客观物质基础的依据。

他认为，进入社会主义，要转变得很自然，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水到渠成”。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过早地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作用，也不能脱

离群众的觉悟水平，急躁地把将来的前途当作今天就要实行的政策。不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经济改造，都应当稳步前进。

后来，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针对当时一些不同的见解，周恩来坚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来认识和判断社会主义。他一方面提出要全面认识过渡时期的目标，指出社会主义最基本标志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所以，仅仅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目标和任务是不完全的。同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国家工业化是经济改造的关键。因此，“过渡时期的中心内容，就是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54页）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的重视，所以他对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时出现的那种只讲社会主义改造而忽视国家工业化的倾向是不赞同的。他在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第144页）

五十年代中、后期，周恩来等同志针对当时急于求成的倾向，提出反冒进的意见，受到批判。接着，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遭受严重挫折。周恩来在总结这些实践经验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更加坚定了要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实现生产关系变革的思想，更加明确了生产力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1961年，他在同一位外宾

谈话时指出：“我们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要随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才能相应地完成。如果说我们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那么，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建成，就得花更长时间，然后才能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想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第396页）

在片面注重生产关系变革、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了现实条件的“左”的倾向影响很深的情况下，周恩来却注重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的这一基本点出发，来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存在条件、成熟程度和未来发展问题。从这里，我们不是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后来邓小平和我们党强调的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萌芽吗？

### 三

在我国实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前，“左”的倾向在1957年以后就开始出现并日益严重。在这种“左”的倾向长期笼罩的气氛下，周恩来同志却一再强调，我国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在当时的艰难情况下，这是难能可贵的，充分显示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成熟和坚定。周恩来对“实事求是”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要做到实事求是，不是那么容易的。而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一定要“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指导经济工作。”（转引自《周恩来的思维艺术》第303页）就一定要“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第350页）。可以说，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是周恩来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是他领导我国经济建设指导原则，这一思想和原则贯穿在大至对社会主义发展速度和发展程度的认识，小到每一项具体的经济工作当中。

当1955年下半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等问题上出现一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操之过急的设想时，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他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第190页）。

在制定、实施经济计划方面，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他指出，我们的经济计划，不管是“远景计划”，还是“年度计划”，都必须切实可行，不能冒进，特别要注意“积极稳妥”、“综合平衡”。周恩来提出：“凡是不合乎实际的就要修改”。他认为，计划发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时，就应该修改计划；实际情况超过了计划的，也应该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

在经济建设的各项具体工作当中，在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上，周恩来也反复强调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他认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就要反对经济建设上的浮夸作风，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的思想作风。1961年，周恩来就把实地调查了解到的农民反对办食堂、不赞成供给制的实际情况向毛泽东作了电话汇报。应该看到，那个时候在“左”倾思想日益严重的情况（当时就有因反映农民反对办食堂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精神，是多么不容易，多么可贵。这样做，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减少“左”倾影响造成的损失的作用，而且也为我们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下了基础。

#### 四

当我国开始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具体

运行体制的时候，虽然“学习苏联”是当时唯一的选择，但我国领导人较早地就提出要对苏联经验采取分析的态度，要结合中国的情况来学习。当这种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初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开始逐渐暴露出一些固有的弊端时，一向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周恩来对这些弊端就有所觉察，开始思考和探讨如何改进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重要很有远见的思想。

在所有制形式方面，周恩来看到，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和基本完成以后，在人们的思想中和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种追求所有制和经济组织“一大二公”的倾向，他就开始制止和纠正这一倾向。1956年，针对全国一些地区忽视农业技术条件和干部管理水平盲目地把小社并为大社的倾向，他指示农业部派人实地调查。当年8月，他在会见外国的一个农业代表团时说：在我们国家“最近有希望搞大社的趋向，因此造成一些强迫命令”。他认为，在没有实现机械化以前，合作社“太大了不好搞”，“原来就是小社，不要再让他们组成大社”了。他怀疑有些大社是否搞得不好，主张还应“搞些个体生产”，因为我国农民有“人力畜力耕作时代的个体耕作习惯，同时合作社增产不能很快，所以搞些个体生产，对改善农民的生活是有利的。”“从工业方面来说，小型工厂固然有它的缺点，但是它们在生产经营方面比较机动灵活，容易适应多样的、经常变化的需要。因此，凡是经营合理并且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小型工厂，都应该保存下来，不应该草率地加以合并或者取消。”手工业合作组织一般也“不宜过分集中”，应该“使大社、小社、小组同时存在”，“以便于直接为居民服务，时时便于吸收家庭辅助劳动参加生产”。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他针对当时存在的一味求纯的倾向，提出要允许作为公有制经

济补充形式的私有、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1957年4月,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所有制结构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阐述了他关于多种经济成分的主张。他以开办煤矿为引子明确地提出了各行各业都“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构想。他说:“大煤矿国家办,小的合作社、私人可以开。……搞个办法,把过去的规定改一下,这样有好处。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些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在工业方面,有些手工业,“可以让他们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在商业领域,要“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在城市居民区或者广大农村中,都应该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甚至完全自购自销等等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在农村,“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可以看出,周恩来关于所有制形式和结构的思想是对当时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倾向的一种大胆的纠正。

在分配方式和分配政策方面,周恩来很早就认识到原有分配体制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弊端。他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同时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1956年3月,周恩来指出,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等问题“尖锐地突出来了”,“现在非解决不可”了,“要求我们来一个全面的改革”。基于这种认识,周恩来提出和领导了在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建立新的奖金制度、升级制度,并逐步扩大了先进定额标准的计件工资制的范围。改进后的工资等级制度“对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繁重劳动与轻易劳动”“规定了比较明显的差别。”并且“适当

地扩大了低等级工人与高等级工人工资标准的差距”。对高级知识分子“规定了较高的工资标准”,对知识分子中“有重要贡献的规定了加发特定津贴的制度”。他特别强调,“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地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使他们所得的工资多少同他们对于国家所作的贡献大小相适应。”(\*第172页)在主要反对分配制度中的平均主义的时候,周恩来也提出了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注意社会公平的问题。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周恩来提出了改革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正确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企业拥有一定自主权的问题。周恩来很早就看出了受“斯大林模式”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中央集权过多的问题,看到了传统体制中这一问题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他指出:“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能光靠集权”,“中央集权的政府,权太多了,很容易养成官僚主义”,认为苏联近20年由于“过分集权于中央,进一步集权于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比应有的少了”。(周恩来在国务院体制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6月23日)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改革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分权的思想。他认为,分权问题主要不在于现有的企业究竟是归中央还是归地方管理的问题,“主要的是使地方有权”,“地方除了有党权、政权(就是行政权)以外,还要有人权、财权。”除分权给地方外,还“必须给每一个生产单位以一定的自治权力”,“给它一定的机动范围”,使企业的“经营积极性不受阻碍”。

具有非常突出的务实精神和坚持从生产力角度思考问题的周恩来,较早地看到传统体制的弊端并提出了进行体制改革的思想并付诸实践,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达到我们今天的高度,但其中有些观点是相当深刻的,特别是其基本思路对后来邓小平和我们党全面改革理论的提出是有积极

影响的。

## 五

作为一个后发赶超型的以现代化为发展目标的国家，能否认识现代化的实质，能否认准和抓住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基本动力，是我国实现强国富民这一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非常关键的问题。

周恩来作为一位受过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熏陶、有很高文化素修的知识分子型的国家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非常突出的思想特色和非凡洞察力。他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推动力量，一贯强调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要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是他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最突出的一个特色。在我们刚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1956年，他就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他还从我国科技现状出发，提出了发展科技事业的宏大任务，他说：“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目前是比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得多，同时在质量上也要低得多，这是同我国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的。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33页）在1963年初，他又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第412页）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求尽快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首先，是由于他从本质上抓住了现代化的本质和核心，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化中的极其关键的作用。他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第181、182页），才能推动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其次，是由于他敏锐地洞悉了现代科技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趋势及其在进一步推动现代化方面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周恩来从我国实际出发，对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战略性的安排，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他的主持下，1956年我国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按照规划要求，除基础理论一项外，各项任务均在1962年提前完成。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又主持制定了《1963—1972年科技发展十年规划》。在整个科技事业的发展中，他还极富远见地提出要摆正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我国之所以能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卫星能上天，原子弹能爆炸成功，是与周恩来对科技事业的重视和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正是基于对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这种关键作用的认识，周恩来也就很自然地对作为承担和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正确地解决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怎样认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地位？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重大问题。在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起步的时候，在知识分子问题成为一个突出的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时，周恩来就在党中央于1956年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进行了正确的估价。他指出，经过解放后六年多党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中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中间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1962年，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上，再一次就知识分子问题发表了看法，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进一步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从“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第354页）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再次重申要“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所作的这种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分析和估计，对于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周恩来指出，知识分子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他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需要出发，提出了建立一支包括原有知识分子、知识化的工农干部、大中专毕业生和出国留学学生在内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的任务。

也正是基于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周恩来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同样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一贯强调教育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掌握科学技术的各类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培养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掌握

科学技术的各类人才的教育事业，是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直接和长远影响的一项最重要的事业。

周恩来在对整个教育事业如何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进行了全面、深入、具体的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方针，对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等问题都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的这些思想和实践，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基础，促进了这一重要事业的发展。

今天，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把握现代科技、教育事业发展与进一步现代化的关系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科教兴国”战略，其中，不也包含着周恩来关于这一问题的极有远见的思想和卓越智慧吗？

## 六

在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怎样认识和处理依靠自己力量和争取外援的关系，怎样认识和对待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也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不可回避的问题。

周恩来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出发，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既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又要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思想和方针，较早地提出了采取开放态度、向外国学习的问题。建国初期，周恩来就提出，国家建设要以国内力量为主，“生产建设上要有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第10页）1956年他向党的八大所作工作报告中指出，那种认为经济建设可以依赖外国援助，不要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想法是错误的；而“另一种关起门来建设的想法也是错误的”。周恩来作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战

略活动家，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准则。这些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战后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冷战对待的对立物，反映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愿望，成为国际关系中普遍承认的基本原则。这样，就为我国奠定了为了自身的经济建设而积极主动地实行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基础，获得了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向外国学习的基本条件。

在这样的基础上，周恩来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往来和合作。他特别强调，我们应该“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他认为，“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第255、256页）。

周恩来作为奠定了我国对外开放基础的具有高度洞察力和战略眼光的卓越领导人，一直同当时在对外关系上存在的那种“左”的错误倾向和思想进行着坚决的斗争。1973年2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1973年经济计划时，曾批评和指出了当时的一种错误思想和做法。他说，有的出国考察代表团考察回来，也不敢讲外国人的长处，好像一讲就给我们脸上抹黑。要他去考察，就是要把人家的长处学回来，不然，出去干什么？周恩来明确指出，对于外国的长处，就是要学习。不敢说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说我们自己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他曾经严厉地指出：“极左的做法，说得好，是空想；说得不好，就是破坏。”令人遗憾的是，在“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当时特定的国际政治关系下，周恩来这些关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和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和我们党确立的对外开放战略和政策中，终于得到了实现和进一步的发展。

当我们回顾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回顾周恩来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光辉业绩时，不能不使我们深深感到，要找到一条符合国情、符合客观规律和符合我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也就是要找到一条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具有多么大的难度，同时，又是具有多么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任何在这种探索和开拓中作出贡献的人，都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周恩来作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基阶段和开拓时期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在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国以后，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辅佐毛泽东领导国家建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作用和影响是决定性的。周恩来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在执行毛泽东的基本决策中，在许多方面都有发挥和创造；在有些方面，有些时候，又有所补充和校正；所有这些，都有着他的思想特色。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者和先驱者之一。他所做出的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必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他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执着追求、坚定信念、宝贵思想和不懈奋斗的崇高精神，必将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率领下，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实现几代中国人之为奋斗的宏伟理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